

现阶段的人口地理学

(苏)波克什舍夫斯基

现阶段的人口地理学的本质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人口作为劳动基础的体现者，占有完全特殊的地位。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同时，绝对不可以把劳动消耗看作是与其他生产组成部分相类似的东西，比如说，原料、燃料、辅助材料，以及生产工具那样的东西。要知道，后者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些消极的参加者，而劳动才是生产过程的积极基础。马克思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使我们通过（活的或物化的）劳动消耗的观念来探讨各种生产过程；较大或较小的节约的概念本身是以这种消耗的某种水平为前提的。然而，劳动的体现者是生产者，人口也就是他们的总体。

与人口是生产力，即生产的主体的同时，它在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消费者，按马克思的说法，生产本身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得到完成的（比如，请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0页或第21卷第29—30页）。在个人消费（广义的理解——也包括满足文化要求、各种服务要求、住宅要求等等）过程中，也保证人口本身的再生产。巴朗斯基写道：“一个经济地理学者不可忘记：人口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因此，可以说，经济从头到尾完全是跟人口联系着的”（巴朗斯基，1960年版第145页）。在研究社会再生产地理时，人口似乎具有下列三种性质（从而似乎具有三重的性质）：（1）作为生产的主体；（2）作为社会产品（而且不仅是物质财富，还有非物质财富）总体的一部分的消费者；（3）作为从属于再生产的社会再生产整个过程的最主要环节（即作为人口学的对象）。

如果不研究人，几乎就不可能十分彻底地研究任何一项经济地理学问题。当然，应当说明，这里并非是指一个孤立的人，而是指的在社会上被组织起来的生产者集体。苏联地理学家正确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要离开社会组织和生产活动去研究人口“本身”的企图。甚至在地理科学综合体中新出现的一个支系——休养地理学，好象是只涉及人的本身，而实际上总是要应付一批批的休养者——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特征（阶级的、职业的等等）。

在西方流行的“人的地理学”这一术语，所指的并非是研究人的集体的地理学，而是为了形而上学地研究人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因而可能导致毫无道理的生物学主义，也可能导致经济上的“鲁宾逊式”^①理论。实际上，这种相互作用的主体，从原始时代起就是在社会上被组织起来的人的总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人。

财富的创造和消费的循环是通过社会劳动分工来实现的。这种实现的形式之一就是地区劳动分工。后者是整个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范畴。在一个地区所消费的产品，常常可能是在另

^① 马克思用这个词来嘲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译者。

一个地区所生产的；（活的和物化的）劳动消耗常常不是在实现这些消耗成果的地方进行的。正是这些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空间特点也就构成了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对象。

由于人口的作用深入到所有这些过程，所以应当在经济地理学的所有部门都来探讨人口的劳动活动和人口的利益，而这也关系到经济地理学的各个部门，比如，关系到农业地理学、渔业地理学或林业地理学、工业地理学等。如果不涉及在开辟某些农业地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农业人口迁移形式，我们说那就很难十分深入地阐述农作物或种植业的地理学，在叙述任何区域性经济地理学的特点时，当然不可能完全避而不谈人口地理学。这时，常常会出现一个特殊任务——对大型居民点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同时是生产中心，也是消费的“焦点”。

在地理学科的任何一本有价值的经济地理学著作中，都不可能避而不谈大城市（比如，我们决不能想象，在阐述中央区的书籍中不指出莫斯科）的特点，也不能不讲农业人口迁移的典型单位。

由此可见，人口的特点虽然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于一切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可是我们已经看到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实践的要求）导致人口地理学问题在经济地理学中形成一个特殊的、专门的分支。

怎样才能确定这一分支的科学的内容呢？最简单和简易的方法是：应该确定人口地理学是研究人口的构成和人口与居民点的分布情况。我们认为，更广泛的定义应是：这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所探讨的社会再生产和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人口的结构（以其数量和质量指标）、分布和区域组织。它规定着决定所有这些人口特点的发展、动态规律性（特别是空间的规律性）。

在上述的定义中，强调指出：（1）研究的空间方面；（2）在人口的生产—消费方面和它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来探讨人口问题；（3）必须以历史遗传学的态度进行研究。同时，按照大家公认的把人口地理学看作是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地理分布的这一精神，将它有机地纳入经济地理学。

苏联地理学界十分广泛地采用这一定义^②，所以它在许多方面都同资产阶级地理学家对这一定义的理解发生了争执。美国人认为，人口地理学的任务在于确定各地人口的数量及类型差别并判断这些差别的作用”（《美国地理学》1957年版第116页）。当时曾希望使之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这种表述方法，其内容真是贫乏平淡，大大缩小了研究对象的范围；而且这种表述方法把人口的特征从他们的生产经济活动中完全抛弃了。

我再引用几个著名资产阶级学者的有趣的论调。英国地理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写道：“人口地理学和人口学相似。人口地理学基本上是研究数量的一门科学，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统计资料的。可是，这两种科学也使用从质量方面进行研究的方法。人口学家研究那些说明人口的质量的各种体力的和智力的特点，以便观察它们同数量的关系；而人口地理学则力图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自然与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和中进行研究。（克拉克，1965年版第4页）。这里，克拉克在正确地强调“现象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过份坚持了对人口地理学的数量方面。扎克林·鲍热·贾尔涅(Beaujeu-Garnier)的观点比较进步，他写道：“为了给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下定义，必须给地理学本身下定义：是否只让它成为出生时那样描述性的或成为某些人直到现在还希望保存下来的那种叙述

^② 第一次人口地理学各部门联合会议（1962年）一致接受了近似的提法；苏联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都重复了相似的定义，例如，《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简易地理百科全书》。

性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地理学只能注定成为关于人类在地球表面上分布的观念。……但是，如果接受地理学不仅应当去描述，而且还应该去解释的意见，那么地理学就要在整个复杂的社会地理现象中进行研究……人类的分布、发展和由于因果关系所产生的人的分布、发展和活动^③，这就是人口地理学的三个主要部门”（Beaujeu-Garnier, 1956年版第11、13页）。

为什么说离开经济地理学来解释人口地理学是不合理的？

经济地理学的那些最重要的概念（例如，关于地区劳动分工、关于经济地理状况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也是从地理学角度来研究人口及其在各部门经济中的就业、它的各种移动的一定状况的制约性等等的工具。

绝大多数苏联地理学家都承认，人口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综合性的集体著作和苏联地理学家各届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都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了上述看法。例如，还在二十年以前，莫斯科国立大学讨论人口地理学的发展问题时，萨乌什金就写道：“苏联人口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分支……人口地理学探讨人口的移动、居民点的类型、人口的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生产性质的密切相关的人口的机器装备和动力装备”（《莫斯科大学讲授的地理学……》，莫斯科1955年版第131页）。

那时，本人在苏联地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④所作的关于人口地理学的专门报告中，也强调了这项原则。在为第十九次国际地理学大会（斯德哥尔摩，1960年）印发的苏联地理学观点的汇报中特别着重指出：“如果把人口地理学同经济地理学对立起来，或者把它们作为意义相同的学科放在一起，那就不对了”（《苏联地理学》，1960年版第235页）。最后，还可以引用很有代表性的第一、二两次人口地理学各部门联合会议（莫斯科，1962和1967年）所作出的决定，在这些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决议中曾经写道：人口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领域”^⑤。

我认为，使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贫乏起来，并把这种内容仅仅缩小为对物质生产本身（比如说，只是工业生产点或是个别农作物生产点）的分布，就会把人的社会相互关系的地理学问题和生活区域组织的广阔领域排除在经济地理学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如果对于这些相互关系的生产基础不加以分析，人口地理学本身就会成为从区域、观点提出的简单的人口学调查材料。

用越来越丰富的社会经济内容来充实经济地理学，使它接近更高的阶段，可以姑且把它称为“社会地理学”，克服经济地理学中狭隘的分布主义，是合乎规律的过程。现在，这一过程正在苏联实现，并在世界科学界范围内（在实践上）十分迅速地取得进展（拉夫洛夫、阿加丰诺夫，1977年），因而没有必要于经济地理学之外，再为人口地理学在地理科学体系中寻求什么特殊地位。而同时公开承认，把人口地理学有机地纳入经济地理学之内，将能大大加速和强化人口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本身发展中的这种进步倾向。

在西方各国的课程、参考书结构和多种会议的部门构成中都反映出人口地理学脱离经济

^③ 著者在人口地理学研究的这个第三项里补充写道：“人为了生活应该采取行动，而且地理景观到处都有人的劳动的痕迹：农田、房舍、工厂烟囪、被开垦的处女地、铁路……人的活动各不相同。人的活动究竟是怎样的？人的活动在它和社会的各部门中又是怎样分布的？”（Beaujeu Garnier 1956年版第13页）

^④ 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指出研究人口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没有分组的其他各届地理学代表大会上（例如，1947、1960和1964年举行的代表大会，完全是在经济地理学分组的范围内讨论这些人口地理学问题的。

^⑤ 人口地理学各部门学术联合会议的决议，列宁格勒，1960年（单行本，小册子）；《全苏地理学会公报》，1962年第3号（第二次会议决议）。

地理学而独立的情况，并且声称这两种学科是权力平等的。美国地理学理论家们在有名的《美国地理学》（1957年版）一书中，直截了当地宣称：“把人口地理学划分为地理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根据是：它研究一定范围的现象和经常起作用的过程，并且，它要求运用专门的方法进行研究——即必须掌握统计方法”（第116页）。似乎恰恰是这些特点，不许（而且也不责成！）我们把它看作是经济地理学的有机部分！¹？

把人口地理学从经济地理学中划分出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情况呢？关于这一点，巴朗斯基（1960年）说得很好。他警告说，力图把人口地理学从经济地理学中划分出去，并形成一种特殊的、独立的、具有同种族学相互融合倾向的地理学科，会使人口地理学再次发出人类地理学的气味，推动人们去寻找“各国之间出现差别的原因……但不在社会条件中去寻找，而在人本身的特性中去寻找；因为在各国之间产生差别的始因就是人的特性。人类地理学家认为，人的特性反过来又是由围绕着他们的自然界来决定的，而且将来也不会改变或者只是非常缓慢地改变。这种意见已经接近于种族主义……”（第144页）。

资产阶级地理学的反面经验很好地指出了使经济地理学同人口地理学相对立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去？资产阶级地理学家通常把下列各点纳入关于经济地理学的概念里：关于工业分布的“失去人性的”理论、市场地理学以及“空间经济”等问题；同时，在“人的地理学”的名称下，又摆出了关于抽象的人同自然的关系、关于人的居住点形式、关于住房性质、关于某些生活特点等令人捉摸不定的一大堆问题。然而，对于生产活动却往往估计不足，常常避而不谈阶级关系，关于作为生产集体、即作为生产主体的人口概念本身，实际上却已消失不见了。关于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也缺乏表述清楚的概念。有时却把作为生物个体的人的观念提到首位来。

应当指出，有少数苏联地理学家们，主张把人口地理学从经济地理学中划分出去，可是，在他们自己所执行的实际研究计划中，却把它的内容也完全纳入了普通经济地理学的框架里。

（南致善摘译自波克什舍夫斯基著《人口与地理》，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8年，第26—36页）

人口密度的变化与都市化

（苏）阿拉伯—奥格勒

目前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将会引起世界各个地区人口密度的极大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多情况下将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为了估计人口密度所要发生的变化，联合国的专家们曾在1966年对世界各个地区分门别类地进行过一次预测。他们把全世界分成以下四类地区：一、低密度的发达地区（苏联、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二、高密度的发达地区（除苏联之外的全部欧洲地区及日本）。三、低密度的发展中地区（南亚的西部、整个非洲、南美的热带地区和大洋洲地区）。四、高密度的发展中地区（南亚的东部地区、南亚的中部地区、东亚^①和加勒比地区）。

当然这种分类法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即在许多高密度地区也中包的括了个别低人口密度

^① 不包括日本。